

19 世纪上半叶的俄国 汉学史

□ 李明滨

俄国汉学最终形成为一门学科的时间，应该说是在 19 世纪上半叶，其标志是：一、出现见多识广、有多方面研究成果的汉学家；二、汉学成果已不仅仅是翻译，而是从搜集资料、译介作品进而作分析研究，并撰写著述；三、有成形的教学和研究方法，建立了培养人才的院校。

后一项的事实是已经从仅在国外设立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俄罗斯馆”，过渡到在国内的主要大学喀山大学建立东方系（1807），内有阿拉伯波斯语、突厥鞑靼语、蒙古语等教研室，以及随后设立的汉语教研室（1837）；彼得堡大学的东方系（1854），内设汉、满语教研室。

前两项的代表人物即为比丘林。俄国汉学在初起时，特别在 18 世纪，主要是从帝俄对外政策和对华贸易的实际需要出发，局限性很明显，仅仅是搜集情况，翻译资料，所以汉学，

即有关中国的知识,只是作为一种学问而被重视。而从 19 世纪开始,汉学业已超越这种局限,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反映 19 世纪上半叶汉学的最高成就者,首推比丘林。

一、俄国汉学奠基人比丘林

雅金夫·比丘林(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1777—1853)原名尼基塔·雅科夫列维奇·比丘林斯基(Никита Яковевич Бичуринский),系俄国楚瓦什族人。1777 年 8 月 29 日出生于喀山省齐维利斯克县阿库列沃村楚瓦什族神父家庭。1799 年毕业于喀山神学院,以修道士身份留校任教讲授法语,取法号雅金夫(Иакинф,Иокинф,Гиацинт,又译为亚金甫、夏真特、雅撒特)。在我国早期的文件中曾收其名译为“俾邱林”。

当时他兼任喀山涅夫斯基修道院修士司祭。1801 年任喀山约阿诺夫斯基修道院院长。1802 年升为修士大司祭,任伊尔库茨克主升天修道院传教士学校校长。

1807 年他被委派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第九届传教士团领班(团长),于 1808 年到达北京,在京居留 14 年。学习汉、满、蒙、藏语。1821 年回国。在京期间先后编纂多部双语辞典、多语辞典和关于汉语语法的著作,编译大量经籍与文献,并开始研究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国情,兼及中国北部、西部毗邻地区的情况。

回国时,因其在华期间未能完成宗教使命受到东正教事务管束总局的审判,称他有行为不端,如长期未去教堂,无视传教士义务,对下级人员管束不力,甚至有变卖教会财产和出入青楼等状,被判处流放。一说是他怀疑“灵魂不朽”,并讲了“基督并不高于孔夫子”^①等有亵渎本教教主的话。他于 1823 年 9 月 4 日被关押

^① 转引自米·阿列克谢耶夫:《普希金与中国》。

于瓦拉姆修道院(实为宗教罪犯的监狱),1826年11月1日获释。历时三年余,但他在狱中并未中断研究工作。

获释后他任外交部亚洲司译员,由于研究工作成绩卓著,他1828年12月即当选为俄国科学院东方文学和古文物通讯院士。

这段期间,比丘林在彼得堡与著名作家普希金、克雷洛夫等过从甚密。1829年又担任彼得堡公共图书馆名誉馆员,负责汉、满文图书的编目工作。

1830年3月,他随科学考察队赴俄中贸易中心喀尔喀蒙古区搜集资料。此事在行前曾引起普希金热烈的反应,使后者向沙皇政府提出申请,意欲同该考察队一起前往中国(未果)。在考察过程中他写了大量通讯资料,被刊登在《文学报》上,造成良好的社会影响,起了宣传介绍中国的作用。他还结识了十二月党人别斯杜热夫等,并曾申请脱离教籍而未果。

1831年他当选为巴黎亚洲协会会员。他于1831年1月在恰克图开办一所汉语学校,该校在俄国属于首次出现为商业用途培养人才的学校。该校从1831年开办持续至1861年。开办后不久他曾返回彼得堡,1835年再度前往任教,至1838年才回到彼得堡。

此后,他主要从事著述,内容涉及中国史地、文化及社会现状。他毕生著译丰硕,最终成了俄国汉学和东方学的奠基人。

比丘林的汉学学术活动从18世纪初开始,持续了半个世纪。他的学术成就表现在三个方面。

1. 学习中国语文、编纂辞书

比丘林初到中国即倾全力于学习汉、满、蒙语。早在喀山时期,他便显示了学习外文的聪慧天资,已经掌握了拉丁文、希腊文和法文。这类外文知识有助于他更快地学懂中国语文。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教科书和汉俄辞典。于是他着手编纂辞典。他

有着一套编辞典的科学原则,他认为一种语言词典的基本词汇应汲取生动的口语,于是他穿上中国服装到市场和街道、商店去,指着物品一一询问,记下汉语的名称,标出读音。他先后编成六部辞典。除《汉俄辞典》外,大部头的多达有 1922 页的《汉俄语音字典》,共九卷(由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保存)。此书费去他许多心血,先后整理重抄 4 次,还依据《康熙字典》作了仔细校订。最后根据发音按俄文字母顺序排列,重抄成九卷。

另外他还编写了许多双语和多语辞典。

由于他还掌握其他欧洲文字,所以在京期间结识的天主教传教士,得以从葡萄牙的耶稣会士所收藏的拉丁文和法文书中,接触到西方汉学家的成果,从中受到启发。他广泛使用各种语言,而且卓有成效。例如通过汉文翻译《四书》。几本西藏书籍则是经由一位姓陈的喇嘛帮助下从藏文翻译的。此外又从蒙文译介了蒙古法典。以多种外文为工具,比丘林便能获得丰硕的翻译成果,当他回国时带去的已是 17 种翻译手稿,重要的如《北京概览》(并附平面地图)。

2. 从事汉学研究,成果丰硕

俄国在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主要关注点在西方,尤其在西欧事务。因而暂时减弱了对东方的注意力。直至 19 世纪中后期及 20 年代初,汉学研究工作才重新勃发生机,其中主要得力于比丘林的活动。

比丘林最早觉悟到从事系统汉学研究的重要性。他在 1816 年 11 月就给俄国东正教院写过一封长信,阐明深入研究中国的必要性。他在北京搜集大量文献资料,1821 年回国时所带的文物材料重达 1.4 万磅(合 6319 公斤)。其中仅汉、满文的中国书籍就有 12 箱,全部文献书籍分由 15 只骆驼驮运。他所带回去的文物资料比前八届传教士团所带回之总数还要多。其研究范围

涉及中国哲学、经济、政治、伦理、民族以及风土人情。研究和著译的成果几乎可以构成百科系列。

(1) 有关中国北部和西北部的著、译

具体说来,比丘林学术研究活动的早期侧重对中国北部和西北部的地理、历史和民族研究,主要是搜集和翻译各朝代的汉文书籍、史地资料,辅以个人的观察,甚至注入自己的感想。例如《西藏志其现状,附从成都到拉萨的道路地图》,1—2卷,1828年。此书译自《卫藏图识》。又如据《西域传》、《前汉书》、《西域闻见录》、《西域同文志》等辑译的《准噶尔和东土尔克斯坦志》。所谓“东土尔克斯坦”是俄文中对我国新疆的指称。《修道士雅金夫蒙古纪事附蒙古地图及各种服装图》则是他由辑录资料而撰写的。此外,还有据《新疆识略》和《西域闻见录》等辑录撰成的《厄鲁特人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十五世纪迄今)》。

这些著译连同他撰录的《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系据《元史》和《通鉴纲目》和《西藏青海史》)等书,使他的威望大增,俄国人士认定他们第一次有了通晓中国西藏、青海、新疆、蒙古的专业人才。实际上比丘林也是俄国最早兼备汉学家、藏学家、蒙学家和满学家身份的东方学家。

比丘林正是凭这些著作于1828年12月被选为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的,这也是俄国汉学家中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

(2) 有关中国国家制度和一般国情的著、译

这一部分的著译尤其能够显示比丘林的功力。主要的著作有:《中国的民情和风尚》(手稿),《中国,其居民、风俗、习惯和教育》,《中华帝国统计概要》和《中国的农业(附72种农具图)》等,后一种系据《授时通考》辑成。

此外,还有关于首都的著作,系摘译自《镇元史略》而辑成的《北京记述(附1817年绘制的京师地图)》(1829年,Описание Пекина.)。

比丘林对自己的成果估价颇高,他不无自豪地说:他整整 13 年所从事的中国研究,一个人的成就比所有东正教传教士团在过去 100 年的成就还要大四倍。^①

在他未出版的手稿中,还有一批关于国家国情的著译手稿。如《大清一统志》、《通鉴纲目》、《儒教及其礼仪》等。

(3) 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

比丘林早在 1820—1821 年就翻译出了《四书》,手稿未出版,1829 年翻译出版了《三字经》。

他不仅翻译,而且作了精辟的注解,把翻译同研究结合起来。这一经验已为俄国后世汉学家所重视。尤其《三字经》译本已被视为范例。

比丘林不但与普希金、克雷洛夫等作家是知交,而且与十二月党人别斯杜热夫等人也过从甚密。也许是由于十二月党人朋友的影响,他在 54 岁时曾决定脱离东正教教会(未获批准)。据同时代人马利诺夫斯基的日记,这位受总主教指控而关进修道院的僧侣,已经怀疑灵魂不死,而且“认为基督并不高于孔夫子”。足见他研究汉学的心得非同寻常,而汉学知识也反过来给予他非同凡响的影响。

他对汉学研究的执著,就连他在受东正教事务管理总局法庭审判后,关押在瓦拉姆修道院的三年多时间里,也没有中止。而且,由于研究的深入,他还能具有独到的见解,表示不赞同西欧汉学家“总爱用阴暗的笔调把中国写得一团漆黑”。

比丘林的汉学成果具有长远的价值,后人不断加以发扬,一再予以重版。他辑译的《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Собрание сведений о народах, обитавших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древние времена. ч. 7—3. СПб, 1851)一书三卷曾于 1853 年出

^① 《俄国汉学的比丘林时期》,《远东问题》,1975 年第 1 期。

版,100年后又在1950—1953年重印(三卷)出版,而且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印造。

同样,另一本书《东亚和中亚历史地理资料集》则由后代汉学家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古米略夫等人整理编辑,于1960年出版。

3. 开办汉语学校培养人才

比丘林不仅编纂了多部双语字典,而且写成了汉语语法书《汉文启蒙或汉语语法》,被作为教材长期使用。它从1835年出版开始,先后作为恰克图汉语学校和喀山大学东方系的教科书,直到20世纪头十年,仍然是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课本。它在1835年和1838年一再印刷出版,在1908年还在中国印了北京版。

他的突出贡献还在于1831年在恰克图创办了第一所汉语学校(1831—1861),并亲自任教。他当时所制定的学制、教学计划和教材,也为后人所师承。这一切均为俄国的汉语教学从方法论上奠定了基础。

比丘林在恰克图从事多年的教学活动(他在开学后不久曾返彼得堡,但从1835年再次前往任教,直至1838年才重返彼得堡)后,又回到他所热衷的研究和撰写书著的工作,重点在著述介绍中国历史、哲学和文化,以及一般的国情。晚年以《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等》一书再次获得“科学院奖”。

比丘林促进了俄国汉学最终形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而他充满曲折经历和传奇色彩的一生也成了小说创作的题材,已经有苏联(俄国)作家为他写出了传记体小说《雅金夫·比丘林》(1985)。如今在彼得堡市中心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内矗立着一座他的陵墓,墓碑上用中文题写他的姓名。

二、留华时间最长的教士学者

以教名鲍乃迪(今译巴拉第)闻名的东正教传教士团的修士大司祭彼得·伊凡诺维奇·卡法罗夫(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Кафаров, 1817—1878)可算是驻华时间最长、研究成果丰硕、活动面广,因而闻名于世界的教士学者。

他出生在今鞑靼共和国境内的契斯托波尔市,1838年毕业于喀山传教士学校后,又就读于彼得堡神学院。作为第12届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助祭于1840年到北京,至1847年回国。次年升任大司祭。又于1849年和1864年先后两次出任第13届和第15届传教士团领班,前一次在京时间为1850—1858年,后一次为1864—1878年。这样他三次来华,一次为团员、两次为领班,共居留中国33年。成为俄国传教士团中留华时间最长的人。

其所编的《汉俄合璧韵编》是当年在欧洲的同类字典中最为完善的。这部大型辞典可谓他毕生学术活动的纪念碑。它分为上、下两卷(各为636页和737页)于1888年在北京出版。那已是在作者死后十年的事。由于巴拉第1878年退休回国时取道欧洲,不幸猝死于马赛客途。故该辞典由柏百福(П. С. Попов, 今译波波夫)续完才问世。

巴拉第的一项重要成就是继承了比丘林对中国北部以及蒙古的研究,完成了一批重要文献的翻译和加注的工作。如《元朝秘史》、《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国人张德辉在十三世纪上半叶的蒙古游记》等篇(以上均在1866年和1867年发表)。

此外,还有一批译注加诠释的作品如据《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本译注的《中国关于成吉思汗的古老传说》;以及自己撰写的《乌苏里边区简史》,《南乌苏里地区的民族学考察》。后两篇系作者于1870—1871年参加俄国地理学会组织的考察队,在黑龙

江和南乌苏里江作考古和民族调研一年的工作所写。同时,他两次从北京回国期间,都沿途作了札记,后写成《修士大司祭鲍乃迪1847年和1859年蒙古纪行》。

巴拉第对于部分《马可·波罗游记》也作了生动有趣的注解,形成《修士大司祭鲍乃迪评注马可·波罗之华北纪行》。足见他涉猎的领域之广。

巴拉第的著作还有两类具有历史价值。一类是有关佛教、萨满教和基督教在中国流传的情况,如翻译的《佛陀传》、《古代佛教史略》、《基督教在中国的古老痕迹》以及《伊斯兰教汉文文选》等。

再一类是他的日记和札记。巴拉第一生勤勉,无论做什么事,到过什么地方,他都勤于动笔,做出详略不等的记载。他居留中国期间,恰好中国有几件历史大事发生,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和英法联军侵华等,他都做了记载。如《修士大司祭鲍乃迪1858年日记》写的就是英法联军侵华时期见闻,具有史料价值。同样情况的还有他写给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和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岳福(Н. Н. Муравьев-Амурский)的报告和通讯。

当然,正如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具有双重性和多种作用一样,巴拉第的活动也有双重性。作为汉学家,他有积极推动汉学研究、创作汉学成果的作用;作为传教士团的领班,他负有俄国政府赋予的使命,起了为其本国政府实行侵华政策服务的负面作用。例如他向穆拉岳福总督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提供有关京津的重要政治军事情报,并且提出建议,使俄国政府得以抢在英法之前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此外,他还曾与普提雅廷策划帮助清廷反对太平军。这些都是无可回避的事实。

巴拉第由于地位特殊,其汉学成果的命运自然不同于某些别的汉学家只能停留在手稿上,而是几乎全部得以发表,主要的发

表园地便是他本人创办的《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著作集》。该著作集先后出版过多卷。其中第四卷(1866年出版)所收的全系巴拉第的著作。这也为后人研究他的活动提供了资料集中、便于查找的方便条件。不过,其他各卷也有零星的属于他的篇章。

三、传教士团出身的官员学者

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培养出来的一些官员也同时从事汉学研究,从而成为闻名的学者。卡缅斯基、查哈罗夫、斯卡奇科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819年以后先后当选为俄国科学院研究东方文献和古文物的通讯院院士的巴·伊·卡缅斯基出身于教士家庭,原为第8届传教士团成员(1794—1807)回国后升任外交部八等文官,1820年被任命为第10届传教士团领班,开了官员任传教士团领班的先例,并获修士大司祭神职。但他居留北京10年(1821—1830)后回国即还俗。其主要贡献却在于大量的译稿,包括史地、民情和国家朝政的文献,而且编成多部双语辞典:《俄华例句详解大辞典》、《汉满例句详解成语词典》、《汉语发音词典》和《蒙满俄拉丁语辞典》。可惜均为未出版的手稿。

他兼通汉、满等多种文字,其研究领域广而且深入,甚至把图理琛的《异域录》译成俄文。

曾经担任俄国驻伊犁领事和总领事达15年(1851—1864)之久的伊·伊·查哈罗夫(Иван Изхаров, 1814—1885,原译杂哈劳)情况略有差别,他出身于第12届传教士团学员,居留北京10年(1840—1849)。他曾任会勘地界全权大臣,参与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条约》(1864)等多项活动,主要职务是外交官员。但自1866年辞职以后,即在彼得堡大学执教满语(1868年起),先后获彼得堡大学满语文学博士(1875)和教授(1879)学衔。尤其以

1875年编辑出版《满俄大辞典》而闻名遐迩,成为通晓汉、满语言的满学家。

曾三次来华、两次任驻塔城领事(1859—1862)、天津领事(1867—1879)的外交官康·安·斯卡奇科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Андрионович Скачков, 1821—1883,另译孔琪庭)出身于第13届传教士团,于1848—1857年居留北京。他对俄国汉学的贡献则别具特色。其特点有二:一为广泛搜寻中国图书,“其收藏汉籍善本之富,为当时俄国之冠”^①。这些书现存于莫斯科国立列宁图书馆。二是深入考察民俗、研究民间生活,著有大量文稿。

斯卡奇科夫在华时间(包括任东传教士团、任领事官职等)共计26年之久,得以深入考察民间风俗、观察宗教礼仪和农家活计,出入茶楼酒馆,获得大量现实资料和印象。他写的文章往往选题新奇,出人意料。小至《北京运河上的郊区茶馆》(附插图,1858)、《温泉乡石窝农家生活写生》(1851年6月—1856年3月日记),大至《论俄国人在塔城(Чугучак)的贸易》(1860)、《中国天文学的命运》(1874)和《论由海路运入中国茶叶》(1882)等。

为了深入社会生活的实际,斯卡奇科夫还和农民交朋友,并亲自务农以取得切身的经验。他在这方面的论述文著颇多,如《谈谈中国的农业》(1867)、《中国的烹调》(1883)、《论中国人的地理知识》(1866)等。

从《我的务农日记》等几种资料中,可以了解他还亲自种植茶、瓜、豆、谷、花卉、草药、果树等共达343种,并且喂养家蚕与野蚕。因此,他还写出了《论中国蚕的品种》(1856)和《中国人放养野蚕的树木》(1862)等文章。

斯卡奇科夫对农业生产和社会民情的兴趣极为浓烈,对此他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并加以翻译,使得他的汉学成果独具特色。如

^① 《俄苏中国学手册》,上册,85页。

下的译稿《开辟历数通书》(1851—1853)、《汉代天文史》、《古今米源》、《救荒活民》、《续茶经》、《授时通考》、《尚书尧典》,还有他撰写的手稿《中国的农业》、《中国的工艺》、《中国的蚕丝业》、《中国的百科全书》、《中国的风俗》、《中国天文学和气象学研究资料》、《中国书目》、《关于中国地理的描述和笔记》等等,可以构成有关中国知识的“百科系列丛书”。连同他在华期间的公文、信件、日记、图片、各类手稿多达 18 类数千页,其中单计农业类一项就多达 2000 余页。这些资料悉数存于莫斯科的国立列宁图书馆手稿部。

斯卡奇科夫涉猎的范围之广,文稿包括社会生活方面之宽,不但在俄国汉学家中,而且在世界汉学家中都是罕见的。

此外,他写的《我的政治日记》(1854 年 1 月—1856 年 5 月)不仅广泛记载了 19 世纪中叶中国农民的生活场景,而且涉及太平军起义时期北京的情况,极富有史料价值。

他还是在俄国最早译出《东周列国志》的人。

四、汉学的摇篮——喀山大学

1837 年喀山大学东方系设立汉语教研室,这是俄国汉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两个转移:一是汉学基地由俄国之外转移到俄国国内,即由驻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转移到国内的喀山(随后是圣彼得堡)。这不单纯是地点的变换,而是还具有学术研究出发点的变换,也就是更能从俄国的国情需要出发来研究中国,同时更能以俄国为参照系来对比中国,以进行深一步的研究。二是汉学教育由个别汉学家如罗索欣、比丘林等开办的普通汉语(汉满语)学校转移到高等学府,提升了培养人才的层次,使汉学人才从普遍的实际工作如译员、经贸实践人员提升到具有高等教育水平、接受过大学的科学研究训练的学

者,或学者型的实务人员。他们日后就有可能成长为训练有素、卓有成效的汉学家。

喀山是伏尔加河的一个港埠,位于卡赞卡河口附近,现为俄国鞑靼自治共和国首府。人口约 101 万人。该市始建于 13 世纪,1438—1552 年曾为喀山汗国的都城,当时系由金帐汗国分离出来。在 16 世纪 20 年代,喀山汗国军队曾对俄罗斯造成侵扰,但 1487—1521 年又曾臣服于俄罗斯,1524 年起改为臣属于土耳其。后来 1545—1552 年俄军远征喀山,消灭喀山汗国,始将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归入俄国版图。

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喀山鞑靼人,其次有马里人、楚瓦什人、乌德穆尔人、莫尔多瓦人、巴什基尔人等,多为东方民族,还有俄罗斯人。而喀山是控制伏尔加河航道和通往西伯利亚的要冲,又是东北欧同高加索和中亚等地的商业纽带。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从它的地理位置、交通、居民和物产条件看,很容易成为通向东方的咽喉,更有需要培养与东方交往的人才。

喀山拥有众多古迹:从 16—18 世纪先后建成内城、修尤姆别基古塔、彼得保罗大堂、马尔贾尼清真寺、喀山大学古典风格建筑群等。它又是文化中心。

喀山大学创办于 1804 年。1807 年建立东方系,下设阿拉伯—波斯语教研室、突厥—鞑靼语教研室、亚美尼亚语和梵文教研室、蒙古语教研室。因而喀山大学不仅是俄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而且是俄国东方学的摇篮。喀山大学于 1827—1846 年由著名数学家洛巴切夫斯基担任校长,经他的倡议,于 1837 年成立汉语教研室,曾在北京居留十年的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成员西维洛夫(Д. Сивиллов)担任教研室主任兼教授,讲授汉语,并编成俄国第一部《汉语文选》,亚·李斯特尼茨基(А. Ристницкий)任口语实践课教员。

随后,1844 年又建立满语教研室,由奥·沃伊采霍夫斯基

(O. Войцеховский)任满语教授。沃伊采霍夫斯基系乌克兰族人,曾为东正教驻北京第10届传教士团的随团医生,于1820—1830年居留北京。他回国后在喀山大学除了先任满语教授外,又于1844年接替刚辞职的西维洛夫继任汉、满语教研室主任,后于1850年去世。

此外,鲁什科在李斯特尼茨基于1843年去世时接任教授。还有一位喀山中学学监伊·卡里莫夫(И. Каримов)兼任过汉语教授。而瓦西里耶夫则自1851年起任汉、满语教授。

由于俄国政府调整学校工作,喀山大学东方系于1855年停办,教员和学生转入圣彼得堡大学,合并于该校的东方系,但喀山大学仍保留鞑靼语科。

这样一来,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存在了18年,满语教研室存在了11年,却做出了不少成绩,其办学经验证明,在高校讲授汉、满语不但可行,而且必要,尤其能克服驻北京传教士团和一般汉满学校培养的人才缺乏高教水平、因而不能很快独立进行汉学研究的状况。此外,创办于1821年的《喀山大学学报》,经常发表东方系师生的文章和著述,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该系的成就。

不过,该系办学也有一定的困难,主要是中俄两国之间贸易额不大,增长也慢,毕业生难于就业,工薪低微。且汉、满语文学学习的难度大,是故学生人数逐年减少,能坚持学到毕业的人更少。往往不到入学人数的一半。

不过,喀山大学也推出了几位著名的汉学家。

首先出现的是一位属于19世纪上半叶的汉学家、汉语教研室主任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西维洛夫(Дмитрий Петрович Сивиллов,1798—1871)。他出生于俄国奔萨省戈罗季斯克县克尼希村一个神职人员家庭,其父为诵经士。他于1810年入奔萨省传教士学校就读,1818年入外科医学院,随后不久又转入亚历山大一涅夫斯基修道院传教士学校,1819年成为传教士,教名为

丹尼尔(Даниил)。

西维洛夫于1821年参加第10届东正教传教士团,作为修士司祭来到北京,至1830年回国。其教职曾升任至修士大司祭。1837年就任喀山大学第一任汉语教研室主任,至1844年因病辞职入修道院。

西维洛夫为19世纪上半叶推动俄国汉学的一位重要人物,其主要贡献为1840年编出俄国第一部《汉语文选》,又提出汉语也有语法规则的思想,主张为汉语(古文)加标点符号。他身后遗有大量手稿未出版。其学术成就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为编撰多种双语和多语辞典以应教学需要,如有《华俄常用语辞典》、《法汉满成语辞典》、《拉丁语词典》和《拉汉辞典》。这四种辞典均为未出版手稿,今存于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室。他所编有一部《汉语文选》(附词汇表)系属于俄国首次编出的该类书籍,现于鞑靼自治共和国中央档案馆有存书。

二为译介中国的古籍。计有译稿(未出版)《四书》(Четырехкнижие, 四卷, 1840—1842)、《诗经》(Ши цзин, 1855)、《书经》(Шу цзин, 1855)、《明心宝鉴》(Минь-сцнь-бао-цзянь, 1855)、《孟子》(Мэн-цзы, 1855)和《老子的道德哲学》(Нравствен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лао-цзы)等。此外存放于喀山大学图书馆的一部《道德经》(ДаоАэцзин)亦系他的手译。

西维洛夫在1831年曾写出一本《中国儒释道三教简述》的综合介绍书,全书共66页。

另一位知名汉学家是乌克兰人奥西普·巴甫洛维奇·沃伊采霍夫斯基,他在乌克兰学术界目前已成了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与中国文化交流早期代表人物的象征。^① 由于过去谈到与中国

^① 基辅大学文学硕士纳塔利娅·伊萨耶娃:《中国文学在乌克兰》,《岱宗学刊》,1998年第2期。

文化交流时,通常把苏联作为整体,不大注意各加盟共和国内有关人物的国籍或所属民族,现在各国已宣布独立,这个问题自然就突现出来。沃伊采霍夫斯基自然就是早期乌中文化关系的代表了。

他出生于乌克兰基辅省利波韦茨克县,毕业于基辅神学院,后来又就读于外科医学院至毕业(1819),便以随团医生的身份自愿于1820年随第10届东正教传教士团到北京。

沃伊采霍夫斯基在华成了传奇式的人物,是因为他治愈了礼亲王的病,并于1820—1821年为防止霍乱病的流行而建立了功绩,从而声名鹊起,终于在回国之前,于1829年11月14日荣获“鹊仙妙术”匾。他在中国对传授欧洲医术和吸收中医中药方面多所建树。他在编纂《满汉俄语辞典》中收入了大量中草药名词条目,同时还搜集中草药的标本。^①

他在1830年回国后继续当医生,直至1844年就任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主任,后又主持成立满语教研室,为该校的首任满语教授。他曾讲授满语语法和满族史等课程,是俄国满学的开拓者。其著译也围绕着满族、满语这个总题目来进行。如有《供汉满语文学生和初学者用的课文》、《满语之法规则新释》和《〈清文启蒙〉汉满文分析》等。

五、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引进

俄国虽然早就注意中国文学,18世纪便有人开始译介,但在近百年时间里只有零星的几篇文学译作。即便在19世纪,译成

^① П. Е. 斯卡奇科夫:《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俄国医生》,《苏联汉学》,1958年第4期。

俄文的中国文学作品,也为数不多。据现在已知资料^①的不完全统计,整个19世纪发表的中国文学翻译作品和评介文章或论著仅约50种,其中翻译作品约占32种,评介文章和论著18种。翻译作品中知名的如1827年出版的《玉娇梨》(片断),1832年出版的小说《好逑传》,1843年发表的《红楼梦》第一回,1847年出版的《琵琶记》,其他多是一些诗歌、笑话或民间故事及传说。到19世纪后期才译介古典名著《聊斋志异》中的若干篇,如1878年《新作》杂志上的《水莽草》,还有1883年瓦西里耶夫翻译发表的《阿宝》、《庚娘》、《毛狐》等5篇,1894年发表的《李娃传》。当然俄译诗文中也有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1874年发表)这样的名篇。还应当注意到当时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往往不是根据中文原作,而是从其他欧洲文字转译。《玉娇梨》即转自法文,有些诗转自德文,《好逑传》则是先有英译,转成法译后再译成俄文的。有些译文至今未查出其中国原作是什么,许多译文只有未及出版的手稿。可见中国文学作品在俄国流传的范围还是很有限的。

除了翻译作品,中国文学传入俄国的另一种方式是俄国人写的评介文字。在前面谈到的18种评介文著中有不少是述评式的文章。如《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学报》从1868年至1872年的五年中,每年都有一篇《中国文学新闻》(北京通讯)。《东方评论》1890年第6期发表汉学家阿·伊凡诺夫斯基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东方部博物馆的讲稿《中国人的美文学:小说、章回小说和戏曲》等。这类文章虽然不长,却因是登在刊物上,无疑能造成更广的影响,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文学。俄国的一家主要杂志《祖国纪事》1843年第26期发表的随笔《中国纪行》及文中所附《红楼

^① 彼·叶·斯卡奇科夫:《中国书目》,1932年版,465—474页,莫斯科,并参阅该书1960年版,497—552页。

梦》头回片断的译文,就曾引起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的赞赏”^①并加以评述。

中国文学传入俄国的再一种形式是中国的原文作品。其流传的范围虽然仅限于汉学家,但依靠他们的工作,包括当时及后代汉学家的译介和研究,却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自从两国有了交往,俄国就注意搜集中国的图书资料。1727年瑞典人洛伦茨·郎喀受俄国政府雇用出使来中国,带回去汉、满文书籍8套82本。这成为俄国科学院图书馆的第一批中国书籍。后来该馆发展为闻名世界的汉学书库“亚洲博物馆中国部”(今为东方学研究所彼得堡分所)。

俄国所获中国图书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政府间互相赠送。如1845年清朝宫廷(道光时)应俄国之请求将北京雍和宫所藏佛教经典《丹珠尔经》800余册赠之。同年,俄方回赠151种俄文书籍。^②二是教士使团和外交使团人员的搜购。每届使团几乎都有人受命购书,有的团员也尽其所能罗致。如瓦西里耶夫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书籍简介》文中不无自豪地谈到该校图书馆满文类藏书已“囊括了用这种文字出版和写作的全部书籍”,“因为在清朝首都对满文的注意已经减弱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书商认为满文书无利可图而当做汉文书的衬纸”,这为他的搜罗齐全提供了方便。在19世纪,特别是鸦片战争开始后,帝俄急需了解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和列强在华活动的情报,尤其加强对于各种图书资料的搜集。如第13届使团学员,曾任帝俄驻天津、塔城以及中国各开放港口领事的斯卡奇科夫搜集各种书籍、资料情报,包括有大量公文、日记、手稿。三是高校派人专门到中国购书。如海

^① 博格拉德、李福清:《俄国汉学家德明,他的〈中国纪行〉和〈红楼梦〉部分译文》,《亚非人民》,1983年版第6期,78—87页。

^② 戈宝权:《谈中俄文字之交》,见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549页。

参崴东方学院在1899年建校的当年就派出亚·格列比翁希科夫和彼·施密特教授在内的一批人到沈阳购置大量汉、满文图书。该校叶·斯帕里文教授在1910年编成出版的《东方学院中国图书编目》就展示其所藏书籍甚丰。十月革命后海参崴创办国立远东大学。东方学院随即撤销,所藏图书划归远东大学。当1939年远东大学停办时,其藏书按三路分发。满文书及部分蒙、藏文书送交国立列宁图书馆。朝文古书送交阿拉木图市立普希金图书馆。大部分汉文书籍则在几个单位辗转运送,有一部分落入西伯利亚地区的各类翻译学校,一部分来到莫斯科,成了中国学图书馆的藏书,其中有许多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珍本。^①

在莫斯科的中国学图书馆,广泛征集研究中国问题(主要是中文)的书籍3000多种13.4万件,尤其有珍贵的古代文献和古典作品,包括考古发掘报告、甲骨及金文资料、古代中国诗人和作家的名著木刻本、石印本、旧式印刷本等珍贵文献。据说该馆所拥有的孤、珍本古籍数量在俄国占第一位,古文献数也不亚于国外一些同类的著名图书馆,最古的有公元516年的典籍。^②

俄藏中国古书有《诗经》、《楚辞》的各种版本,有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以及各著名诗人诗作和剧作家的作品的各种刻本、石印本和早期铅印本。例如其中就有乾隆时期(1789)的刻本《楚辞》和光绪年间(1879)的刻本《陶渊明集》(朱墨本)。而《聊斋志异》的各种版本,从刻本《聊斋志异新评》(王士正评,广顺但明伦新评)到《绘图新编聊斋志异说唱鼓词》,种类繁多。光绪二十三年出版的《绘图新刊聊斋》一书,在我国阿英所编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中甚至没有提

^① 李福清:《中国学图书馆馆藏中国古小说》,《中国学图书馆——苏联汉学的史料基地》,47页,莫斯科,1983年。

^② s·戈尔巴乔娃,Н·彼得罗夫:《中国文化的古籍》(东方学研究所馆藏),《苏联科学院通报》,1959年第9期,90—92页。

到。

像这种在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和孙楷弟编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作家出版社 1957 年版)都未曾提到的古书还有《东周列国志》的三种版本(刻本两种、旧排字本一种),《后列国志》刻本一种,《绘图续封神》石印本一种。

有不少章回小说同孙编书目对比,虽然书名相同,但或在绘图,或在回目,或在序、评、注方面有别,显然是不同的版本,如《绣像两汉演义》、《绘图双凤奇缘全传》、《金瓶梅》的两种旧刻本、《新说西游记》、《结水浒》、《捉鬼全传》等。

更为难得的是苏联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的发现,^①为我国已知的《红楼梦》12 种抄本之外,增加了第 13 种抄本,即“苏联列宁格勒亚洲图书馆藏本”^②。此抄本系由 1830 年来华的第 11 届教士使团学员巴维尔·库尔梁德采夫于 1832 年(道光十二年)回国时带去的,共 80 回,于 1964 年由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在调查小说俗文学各种不同藏本时发现。现藏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已于 1986 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分成六册出版。这大概是我国最早流传到俄国去的文学作品之一。

与库尔梁德采夫同届来华的学员阿·科万科谈到他们珍视《红楼梦》的缘由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来华后“需要尽快学会口语,但又无法经常同中国人接触,为了学习汉语,我开始读《红楼梦》。这本书是用地道的口语写成,因此正合我意”。又说,“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喜庆节日,婚丧嫁娶,消遣娱乐,官吏宦官的舞弊,奴婢的机诈……这一切书中都有惟妙惟肖的描述”。“如果把这本书译成俄文,那么那些想了解中国人习俗或希望学习汉语

① 孟列夫、李福清:《前所未有的〈红楼梦〉抄本》,《亚非人民》,1964 年第 5 期。

②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前言”,第 5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

的人将受益匪浅。”^①因此他曾在1863年回国后以“德明”为笔名写的10篇《中国纪行》(登在1841—1843年的《祖国纪事》杂志上)随笔中,于第九篇随笔之后附上他译的《红楼梦》第一章前半部分。这可以说是《红楼梦》最早的俄译。

据李福清、孟列夫调查统计,在此抄本传入俄国以前,1820年第10届教士使团曾购去两部《红楼梦》,各为四函,分别为帝俄政府亚洲司图书馆和伊尔库茨克图书馆所藏。此外,在1794—1807年来过中国的卡缅斯基(后为第10届教士使团团团长)也曾带去一部萃文书屋本的《红楼梦》和另一部《红楼梦散套》,现分别保存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图书馆和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这些算是俄国图书馆中最早的《红楼梦》版本。目前在俄国图书馆中,保存了60多种刻本的《红楼梦》及其续集。

翻译的作品中,《三字经》一书值得专门谈一谈。谈起《三字经》的西传,一般总以为美国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裨治文(1801—1861)1835年出版的英文译本为最早。裨治文1830年到达广州,1832年创办《中国丛报》(旧译《澳门月报》),自任总主笔。他还与人合作,把《圣经》译成中文,把中国古籍译成英文,流布开去,颇有名气,其对《三字经》译本自然也受到注意。据后人查考,此书并非是第一个外文译本。“其实在此以前约一百年,俄国人就已经与《三字经》订下汉学姻缘了。”^②

俄国人翻译《三字经》不但早,而且多次出版,有历史的延续性。后来出访俄国的中国人也曾见过此种书。如清光绪十三年(1887)奉派赴俄考察的户部主事缪荃孙在《俄游汇编》卷八中有所记载:“其译成俄文的中国书,则有古文《尚书》、《孝经》、《三字

^① 此几段引语均转自李福清、孟列夫:《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的发现及其意义》,见曹雪芹:《石头记》(列藏本)第1册,3、4页。中华书局1986年。

^② 蔡鸿生:《〈三字经〉在俄国》,载《百科知识》,1987年第1期。

经》、杂小曲。”

最早接触《三字经》的俄国人，是据 1727 年签订《恰克图条约》得以随东正教使团来华留学的学员。他们进入设于北京国子监的俄罗斯馆，所用的识字课本即为《三字经》。该书三字一句，两句押韵，易读易记，共 378 句，1134 字。外国人既可用于学汉语，又可作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风尚的入门。其内容正所谓包括“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川之奇，历代帝王之统绪，诸子百家之原由”，是一本很实用的启蒙读本。

第一次译成俄文者是伊拉里昂·罗索欣(1717 或 1707—1761 年)，1729 年随第 2 届东正教使团来华的学员。译稿未出版，存于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今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手稿部。但罗索欣于 1741—1751 年在彼得堡办华文馆时，以《三字经》为课本，其译稿曾作为解说中文原本的教学资料使用过。罗索欣作为俄国早期的汉学家，还译过《千字文》、《二十四孝》等十几种中国书籍。

第二次的译者是 1742 年随第三届东正教使团来华的学员阿列克赛·列昂季耶夫(1716—1786)，其大量著译已有 20 余种出版，如《大学》(1780)，《中庸》(1784)等，在欧洲这是首次译本。列昂季耶夫所译《三字经》收在彼得堡帝俄科学院于 1779 年出版的《三字经、名贤集合刊本》一书中。此书系《三字经》在俄国和欧洲首次公开出版的外文译本。时当叶卡捷林娜二世女皇追求树立“开明君主”的形象，译本立即受到官方的重视，《彼得堡通讯》于 1780 年发表评介，称之为“诗体箴言”。

影响最大的要算第三次的译本。译者就是比丘林。出版之后从 1829 年底至 1830 年初就有四家俄国报刊加以评介。

彼得堡的《北方蜜蜂报》(1831 年以前每周出版三期，以后改为日报)于 1829 年 12 月 21 日发表书评，特地引出《三字经》里的诗句来加以推荐。如“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幼而

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莫斯科的文学评论和社会政治刊物《莫斯科电讯》于1829年第24期发表文章,评论《三字经》的思想内容:“东方哲学在欧洲人心目中固然古色古香,但其雄深素朴却令人惊叹不已。”文章转录如下的诗句:“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另一家杂志《雅典娜》于1830年第一期发表的评论指出,从《三字经》可以见到“中国人的德性和智能”^①。宣传《三字经》最有力的是《文学报》的一篇书评。

在俄国颇有影响的《文学报》,于1830年第一期(元旦专刊)载文,对《三字经》给予好评。但该评论文章未署名。由于该报的编辑和发行人是普希金的至交——诗人杰尔维格(1798—1831),后者同时编有两家报刊:《北方之花》丛刊(1825—1831)和《文学报》(1830—1831)。而杰尔维格负责编辑《文学报》的时间是1830年1月1日至1831年6月30日,系每五天在彼得堡出一期,6月30日以后则由索莫夫编辑。而普希金恰好在杰尔维格任内直接参加该报的编辑出版工作。这就使人联想到“元旦专刊”发表的书评同普希金的关系。

此文章的评述相当详细又深入。文章先写道:“《三字经》的本意是‘三字圣书’,因为它每一行都由三个汉字组成。它成书于13世纪。(译本)前言中论及这本书时指出,‘三字经是简明的儿童百科全书,由宋朝末年王伯厚^②编写。其从阴阳五行、天运四季讲起,接着讲人的行为中的三纲五常……言语简练却内容充实,用语朴素而含义深刻’。”

文章的一个重点是肯定比丘林翻译《三字经》的意义和贡献,强调该译本在学术上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亚金夫神父翻译这本书,旨在让它成为俄国人阅读中文翻译的指南,因为书

^① 转引自蔡鸿生:《〈三字经〉在俄国》一文。

^② 王伯厚,即南宋学者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官至礼部尚书。

中阐述了中国人的一切思辨,并附有欧洲人感到陌生的、会妨碍他们阅读其他中国书籍的概念和词语的解释。”

文章进一步强调俄译本在印刷和编排上的特色及意义,并对比丘林充满敬意。“我们的学者,东方学家亚金夫神父比丘林找到了回答外国批评家的最好方法,他刊印了自己改写的《三字经》(《中国儿童百科全书》),并附有该书的中文原文。这样,所有真懂和假懂中文的人皆可现将译本与原文核对比较,说话不再是不假思索地胡乱猜测,而是根据事物的实质,很明显的、无可争议的的证据,即凭手中的两种文本。”这里,文章无疑是在指引公众更好地理解该俄译本的价值。

接着文章又具体引用《三字经》中的诗句和讲述比丘林在译本中所加的解释,使读者达到进一步的理解,如引诗中“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这四行诗的典故对于俄国人来说是不大容易理解的。因而文章详细摘录了比丘林译本中所作的解释,即讲述“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及其母亲的故事”,说孟母教子之道恰应了一句俗语:“择友而处,择邻而居”等。

《文学报》这篇未署名的文章,不断有人推测其作者是普希金。远的如普列奥勃拉仁斯基的《普希金在萨马拉边疆区》一文刊《萨马拉大学考古学、历史学和人种学学会通讯》1925年第3期;近的如1966年莫斯科出版勃林诺娃编的《杰尔维格和普希金的〈文学报〉·1830—1831·内容索引》。苏联学者米·巴·阿列克谢耶夫院士(1896—1981)认为:“这种猜测无疑是有道理的。”他在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时,经过研究,断定该文作者系普希金的根据有:(1)《文学报》从1830年1月1日至1831年6月30日的负责人是杰尔维格,协助并参与编辑的还有另一个人,即普希金。而1830年的“元旦专刊”恰好不是杰尔维格编的。据此考证后认定:“《文学报》第一期是普希金编辑并校阅的,而其正式的编辑发行人杰尔维格并未参加”;(2)从文章的用语看,

极符合普希金的习惯,这是另一个证据。如“评论中有‘Преложение’一词,意为翻译(从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是普希金经常使用的”(莫斯科1959年版《普希金语言辞典》第二卷)。“翻译”一词,在俄文中通常用“Перезод”或“Перевести”,而普希金的用词特别。据此可认定文章出自诗人之手;(3)即便普希金不是该文的撰写人,那么至少在发表以前他就看过这段文字,因为该期稿件是他编发的。^①此篇文章热情洋溢的语词和热烈赞颂的态度,可以看到其文同普希金与比丘林互相敬重的关系是相符的。

普希金的藏书中,还有一本译者比丘林用铅笔题赠的俄文版《三字经》。封面印有:《三字经》(附石印中文本,亚金夫神父译自中文),铅笔写的题词为:“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惠存译者赠”。该书于1829年由圣彼得堡根茨出版社印行。这本《三字经》俄译本也许可作为一种佐证。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俄语系)

① 参见阿列克谢耶夫:《普希金与中国》一文,载《国外文学》,1987年第3期。